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3.05.009

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三维释读: 逻辑理路、总体方略与关键问题

朱婉菁

(温州大学法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元宇宙的形成标志着社会数字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也势必会引致对当前政府数字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创制。技术叙事中有关未来治理的想象,以及现实中基于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游戏”超域效应揭示了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可能性以及前景。以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的上下衔接为基础,提出了以“原理-模式-载体-效能”为线索的逻辑理路。其中,元宇宙支撑构建的数字技术—经济混合规律体系作为治理原理为政府数字治理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而发展出的新型数字情境治理模式以“置换”和“仿拟”逻辑赋予了主体“在场”能力,并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空间”作为载体强化数字治理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以秩序正义为核心的治理效能。从当前政府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出发,构筑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总体方略:包括锚定真实治理需求、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以及耦合数字平台建设3条赋能路径,并形成以重点项目牵引、多元主体联动、多样智能治理连接、复杂智慧体系融入为特征的行动策略。未来,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关键还在于重视“脱域”视界下政府数字治理制度的逻辑转换,强化“游戏”情境下政务平台公共性的保障,以及警惕“超真实”符号世界的内生风险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反思并追问元宇宙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和复兴技术治理的辉煌。

关键词:元宇宙;数字治理;赋能;脱域;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F49;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3)05-0081-14

2021年在人类编年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究其原因,无非在于元宇宙作为一种概念和试验迅速席卷全球。对“元宇宙”一词的历史回溯和探源大多都回归于美国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1992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雪崩》。在小说中,斯蒂芬森所想象的元宇宙(书中称为超元域)在本质上是由电脑生成的虚拟空间^[1],它与物理世界平行并超越物理世界。当然,这一想象本质上也是受20世纪90年代以“数字化生存”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深刻影响。进入

21世纪,元宇宙摇身一变成为了吸引科技行业想象力的最新流行词。按照“元宇宙第一股”罗布乐思公司在其上市招股书中的表述,一个真正的元宇宙世界应该包括以下特征: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随地、经济和文明,其中既需要底层硬件和设备的支持,也涉及日常信用、经济与社区的管理,当然也包括更高级层面的认同、价值与文化^[2]。言下之意,现实世界对元宇宙的规划与设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虚拟游戏的社交属性,尤其是当线上虚拟化日益成

引用本文:朱婉菁. 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三维释读:逻辑理路、总体方略与关键问题[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5): 81-9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ZZ087)

作者简介: 朱婉菁(1987—),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数字治理研究。E-mail:345680248@qq.com

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元宇宙作为网络虚拟化的终极形态^[3],被认为是助力虚拟经济创造发展的最佳载体。

诚然,理论界热衷从游戏、文学、教育、产业等视角进入对元宇宙的阐释之流,但在政府建设层面的话语体系却缺乏相匹配的更新能力。事实上,元宇宙在数字政府建设中不仅大有可为,也应有所为。通常,理论界将数字政府建设划分为4个阶段^①,电子政务成熟的最高阶段是实现“组织虚拟”^[4],该阶段所对应的即元宇宙的技术应用:从当前的虚拟数字平台进化为实体政府的数字孪生体,并最终走向虚拟政府。事实上,简·E·芳汀早在21世纪初期就预见到因特网将作为虚拟世界的赋能者^[5],包括对行政管理在形式上、能力上的纠偏与修正。伴随科技进步的趋势日益表现为“曲棍球杆曲线”^②,元宇宙的发展轨迹与技术赋能理论的有机融合,无论是从宏观到微观,抑或是从静态(制度安排)到动态(治理实践)都有助于形成极为丰富的治理资源,助推政府数字治理的高阶转型。基于“全景视角”^[6],结合我国制度语境考察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可能演化的方向与推进策略,具体剖解为对3个问题的回应:其一,元宇宙(技术/方法)赋能治理的想象空间与现实基础为何?其实这一表述也可置换为对元宇宙本质以及赋能前提的质询;其二,作为待解释项,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真问题与内在逻辑为何?即追问元宇宙从一个科幻概念延伸至政府治理,二者的天然渊源与共同指向;其三,从抽象命题走向具体情境,如何保障行动的有效性?

一、元宇宙赋能治理的想象与现实

1. 技术叙事中未来治理的想象

在有关人类的故事中,回溯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后,人类社会的数字技术演进在之后的20多年狂飙突进,特别是在虚拟现实技术层面不断加速升级,而这种技术发展伴随2021年元宇宙的“横空出世”迎来了重大的叙事重构。其中,从“超越”的角度追问元宇宙的技术本质和治理的未来是传统技术治理叙事转变为实践层面“第一哲学”的重

要契机,它迫使人们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包括:元宇宙能否超越存在主义的实践?以元宇宙集成技术加速发展为标志的人类技术叙事史是否意味着“数字化生存”的极限?日益呈现“去中心化”取向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否意味着传统以政府为核心的中心化治理模式的终结?

就目前技术的发展段位而言,上述问题的答案远未从“迷思”中清晰显现,但以元宇宙为技术架构驱动形成有关未来治理的想象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概念框架:第一,在宏观价值层面,元宇宙中有关生命与自然、社群与团结、美好与繁荣的场景设定都是物理世界中追求的至高价值。这一方向性的预设,有助于为未来治理确立价值锚点。第二,在中观制度层面,21世纪以来,依托技术创新构建去中心化的社会格局重塑权力关系与制度体系的范式逐渐形成,并被广泛接受。而在有关元宇宙的技术想象中,去中心化的自由性始终是核心主题,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元宇宙,对技术创新会更加敏感,形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7]⁶⁴。第三,在微观行动层面,元宇宙所承载的新型虚拟现实技术将可能进一步重塑时空秩序与权力结构,而被视为元宇宙入口的脑机接口技术在未来或许能够实现个体的意识上载与身体限制的突破,带来“我思故我行”的存在主义实践。

2. 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游戏“超域效应”

当扎克伯格将Facebook改名为Meta时,也意味着元宇宙产业链正式落地现实世界。其中,游戏行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并迅速展现出巨大的舆论能量和商业前景。从文学泛海中走出来的元宇宙之所以能够席卷资本市场,并在多个公共领域中产生舆论思潮,某种程度上反

①黄璜等人在《元宇宙政务》一书中指出,数字政府的4个阶段分别是电子化政务阶段、网络化政务阶段、数字化政务阶段和智能化政务阶段。

②统计学家将过去600年科技加速进步呈现出的状态描绘成图,因为它显示出了一种指数级增长现象,被称为“曲棍球杆曲线”。在20世纪,这种图的出现越来越具规律性,尤其是涉及科技的时候。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称为“奇点”,即科技进步达到了逃逸速度的时间点。理论上,奇点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运用不断增强的计算能力来解决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

映了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的“超域效应”:即便不是游戏厂商最初的构想,在商业资本运作下的元宇宙也早已超脱出纯粹的游戏世界。毕马威行业调研发现,76%的受访者认为游戏与前沿科技之间存在共振关系^[8]。玩家在游戏领域的微小需求经由技术放大,最终将对实体经济以及现实制度产生广泛影响,而其中包括良性超域效应以及劣性超域效应。

良性超域效应体现为,游戏世界中的观念与经验对现实世界中的诸多桎梏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正如学者刘擎曾在谈论自由秩序的未来时所评述的:“如果‘后人类社会’真的不期而至,西方自由秩序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并不是被解决,而是可能被完全取消或根本改变”^[9]。而根据可供性理论,元宇宙能够促逼物理世界中的主体按照元宇宙的逻辑内核进行思考与实践,重塑角色意义、行为特征以及组织模式。同时,元宇宙还通过“游戏即劳动”的观念转换,实现数字经济的深度繁荣,重构个体与社群乃至整体社会之间的有效链接,化解技术加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失范。

劣性超域效应则表现为游戏世界的“超速”与“幻象”进一步加速了现实世界的治理危机。游戏世界依托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从娱乐转向一种生活实践,并在现实与虚拟之间营造一种戏剧化的张力结构:或像《超现实主义宣言》所构想的,元宇宙的梦想与现实将被融合成一种“绝对的现实”^[10],促成治理与发展的绝对潜力;或如法国哲学家让·波德里亚所认为的,数字技术基础上的“仿真”将指向一个比当下更加真实的“超真实”世界^[11],进而完成对现实“谋杀”的“完美的罪行”^[12]。但无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事实上都同样存在着对未来治理理想图景阙如的痹症以及对当下前反思性接受的困顿。

二、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逻辑理路

元宇宙的纯数字化世界形态通过将物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全量映射至虚拟世界,将二者充分接榫,重构人类新的活动空间和叙事逻辑,而与现实世界各系统之间的张力更是

激荡了人类的技术思维和时空探骊,析射出数字政治的生命解放。在元宇宙理论架构的数字镜像和时空编织的逻辑递归过程中,政府治理领域的虚实融生显得颇为珍贵,毕竟只有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与规则之治的逻辑辩证关系虚实结合时,才能实现元宇宙技术实践与价值的高度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对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逻辑理路的体察,不仅是“编织”元宇宙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元宇宙在制度层面重塑物理世界的关键环节。

1. 逻辑起点:元宇宙支撑构建数字技术-经济混合规律体系作为治理原理

经济活动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潜在的技术革命能否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所带来的产业效益。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特点不仅在于新兴颠覆科技的广泛运用,而且体现在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乃至政治领域深刻变革的迅疾性与共时性^[13]。言外之意,正是产业界对元宇宙的“情有独钟”,才是元宇宙能够迅速风靡全球并深刻影响现实世界权力运行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因。反之,元宇宙虽然还未全面嵌入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但既有的经济规律体系及其制度合力,正日益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成熟,继而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扩大再生产。简言之,元宇宙提供了一个持续全面的数字技术-经济混合规律体系。而随着政府的参与和监管的双管齐下,未来元宇宙所创造的经济系统能够在另一个维度超越现实世界的体量,实现个体以及组织间广泛且可持续的经济参与。其中,数字经济的持续性和数字技术的同步性成为该系统必不可少的“自我要求”。目前,上海已将元宇宙纳入“十四五”规划;北京则着手以城市超级算力中心的建设推动组建元宇宙创新联合体;浙江业已将元宇宙与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第三代半导体共同作为未来产业先导区的重要布局;成都、武汉、合肥等地都将元宇宙写入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各地正争相进行元宇宙的早期战略规划和经济布局。伴随强大而有活力的新产业崛起,元宇宙主导的数字技术——经

济混合规律体系显然已经初步实现了不同层级共识的交融与型构,包括政策偏好、技术研发方向以及经济产业结构都会产生重大的变革调整。而在规模性的产业崛起基础上,新的规律体系对治理范式影响之大,无疑可以类比于一次“黄金潮”或是发现“新大陆”,为组织运行以及制度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常识性指引。对照元宇宙存续发展的“自我要求”,发展数字经济既是驱动引擎,亦是追求目标,而汇聚交融多种数字技术则是关键手段。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的基础上,实现数据资源价值化以及数字产业普及化,这种双轮驱动的螺旋上升结构给治理创新带来了原动力,此可谓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元规则。

2. 逻辑核心:元宇宙塑造新型数字情境治理作为治理模式

元宇宙的典型表征就是以虚拟产品为主要“媒介”,建构更为细腻生动的仿真场景,实现对现实治理问题的有效“置换”和“仿拟”,即使无法确保模拟推测的精准性,但由于构建了不同形式的模态逻辑,能够将治理的想象性逻辑演变为类似语义学上的转喻,为原本技术治理层面的预测与控制赋予了某种前瞻性与艺术性,生成了包括想象、模拟、预测与付诸行动在内的治理事件集合体。

具体而言,元宇宙将现实生活中的公共事件内置于虚拟世界的情境中,利用全方位三维传感技术营造一种“共同在场”的维度,即在同一个数字空间中赋予感受他人“在场”的能力。不同于当前数字平台应用的二维空间,在元宇宙创造的新型数字情境治理中,治理主体能够自主地选择与治理对象沟通对话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并营造所置身的组织、制度、规范、语言、文化等特殊情境,以此助推形成新的治理情境和意义。区别于微信、微博、抖音等其他具有社交属性的交互平台和互动模式,元宇宙的真实体验感和交互感使“置身其中”的主体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现实中无法参与的治理项目,拥有新的治理感触,进而弥合公共政策的传播隔阂。而元宇宙作为连接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甚至能够连接互动主体之间差异化的生命历程,以不同面向、不同维度构建全

新的叙事文本,既能“亲历”不同治理制度下的实践,亦可“见证”其他主体在该治理情境中的行动。在“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之间切换的基础上借鉴、创新新型数字治理模式,借助沉浸感知、脑机融合、人机交互等技术形成动态交融的深度共情式治理架构,建构全新的数字治理意义。

3. 逻辑支撑:元宇宙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空间”作为治理载体

马克思对治理的“正当性”旨归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治型治理”的实现^[14]。而马克思科学中“自由人联合体”的路径指向,首先要求的是个体在空间层面的解放与正义。立足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背景,个体在空间层面的解放与正义之落脚点在于以数字媒介作为手段,在时间、空间和信息维度上延伸人的能动性,重塑梅洛·庞蒂口中的世界秩序,正是在此意义上,元宇宙的优势一展无遗。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元宇宙不仅为人们的“共时性互动”提供了空间,而且允许人类通过各种终端进入其中进行体验与行动,真正突破了人类物理的空间限制,在生存层面构成了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

通过对媒介技术的演进进行考古学式的考察发现,每一种新的主导性媒介技术都能带来治理逻辑的全面转换,其中治理载体的转换最为显著。从单纯自上而下的电子政务系统,到网络空间的理性交往,再到非中心连接的平台界面,直到跨界融合、人机共生的“自由人联合体空间”。这种治理载体的转换除了有助于治理效率的提升,更深远的价值在于倒逼产生新的秩序和治理评判标准的新面向:一方面,“自由人联合体”以自下而上“以人中心”的内生式自治结构实现了对集中式科层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通过赋予个体能够以实在意识与虚拟分身自由入场并随时切换的行动能力,解构了“总体性支配”对个人的压制,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由此生成“一个所有人‘都是一个人(all one)’的世界”^[15]。而置身其中,不仅能够实现黄仁宇所言的“各种经济因素都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16],而且以加强版的“人”与去中心化的“架构”实现自治与共治的最优效用

函数。

4. 逻辑终点:元宇宙实现以秩序正义为核心的治理效能

当前的政府数字治理依赖于互联网平台,其内在规则与秩序既源于国家赋权,又始终难以规避互联网企业的技术性垄断,公众参与以及信息公开都普遍缺位。而平台的“溢出效应”,又对平台之外的主体产生广泛影响^[17],进一步催生了一种主观偏差、过度信仰与技术依赖的倾向,加剧了公共选择的不正义性。而元宇宙被引入平台治理的整体性技术框架后,不仅实现“场景改造”,并以虚实融合的治理场景打造公众参与的新渠道,而且能够在虚实相生的互动过程中生成受制于代码程序和智能合约的关系秩序。这种新的关系秩序将规则的制定和裁判权下放于元宇宙内的各个社区,理想模式的元宇宙由社区投票表决,治理结果执行不受单一个体或组织机构干扰^[18]。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世界主义“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建构,给予我们重新理解“虚拟世界主义”的钥匙^[19]。例如,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项目,众多“元宇宙”玩家将自发地参与黄河、长江、汉江全流域调研、巡查、反馈,既体现了个体价值,又实现了群体宏观智能^[20]。通过释放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群体智能”,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实然的正义秩序和治理效能,最终达至“善治”状态。

更值得期许的是,在未来,可以利用脑机接口技术对目标群体实现更为直接、精准的偏好洞察与民意捕捉。在此基础上,很有可能破解肯尼斯·J·阿罗提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基于元宇宙的思想与技术架构,对元宇宙下的人的生活利益进行识别^[21],以真实的利益差别为基础构建自治组织,以共同利益为目标,在无限分解的社群偏好中引入基于算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不仅可能对不同偏好加以排序,而且可能推导出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7]65},继而形成约翰·罗尔斯称之为的重叠共识,实现带有全局优化功能的精准治理,最终实现有效的社会正义。

三、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总体方略

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理论观照虽然

大多仍只处于设想层面,但事实上,诸多流程与实施方案已在探索进程中,并呈现出一定可深入扩充的行动要点。例如,杭州空间智治数字化平台作为浙江省“数字国土空间”首批试点场景,基于元宇宙与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对三维空间的高度复现,模拟并反映杭州未来城市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又如上海政务元宇宙的发展,首个“元宇宙”税务社会共治点的启用助力公众在接受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即时、人性化的体验。诸如此类的革新,事实上都旨在打破政府数字治理中存在着的多元协同、绩效监管、开放共享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困局。传统技术治理更多的是关注利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或适应新生态,相比之下,数字治理则旨在“寻求通过感知和响应出现的过程来建立关系理解如何在当下提供帮助”^[22]。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元宇宙所具备形成虚实融生社会形态的技术秉性,恰恰是其“入场”数字治理领域的最佳凭证。在此基础上,构建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总体方略,既要明晰元宇宙区别于其他数字技术驱动数字政府建设的着力点所在,又要结合中国情境下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规划与发展经验,厘清元宇宙作为全新的数字化形态所产生的辐射和衍生效应将会如何重构数字政府以及变革治理模式。

1. 政府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元宇宙赋能路径

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以数据沟通、数字化的整体协作和跨部门的流程再造为核心特征的数字治理成为全球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范式。在多视角识别并抓取当前政府数字治理的痛点之后,将元宇宙作为破除痛点的实现载体,能够有效实现问题、主体及其治理机制的序化关联,进一步展示政府数字治理体系中由“需求锚定+组织优化+虚实情境”所刻画的元宇宙赋能路径。

(1)从“模糊”走向“清晰”: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真实需求的锚定

当前,政府数字治理在整体性治理理念的推进下所进行的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虽然极大地增进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通有无,尤其是近些年“便民服务平台”“12345”智能服务热

线、“接诉即办”平台等的广泛建设为居民诉求表达和参与治理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渠道,但在各类数据平台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民众的诉求表达和治理参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步,甚至发展出“任务超载”与“民意赤字”并存的悖论。究其根源,则在于政府既无力回应民众激增的对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也不愿使自己处于问题压力之下,而解决之道就是实现对民众真实治理需求的锚定。所谓的锚定是比满足更具积极意义的行动方案。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在真实需求锚定上的优势,不仅仅在于能够弥合治理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偏差,而且以更为精密、真实的数字化兜底模糊性事务,帮助政府通过“他者”实现自我清晰的“观照”。

首先,锚定治理需求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认识多元行动者以及需求差异在网络中的客观存在,这是数字治理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确立的第一性思维。基于元宇宙的治理场景怀有将物理世界的体验与数字化体验融合在一起的愿景——它甚至可能成为“终极”的数字技术^[23],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集中访问”和“行为体验”的集合体能够在同一时空全部显现的可能性,进而实现真实需求的“可见”。

其次,真实治理需求“可见”后需要进一步被治理系统所感知,实现“可读”。传统技术治理的本质在于对社会复杂性的化简,压缩信息量,最后化归为一个数字,经历了“社会情境-议题-数字”的3个阶段^[24]。而元宇宙的治理过程恰巧与此“背道而驰”,却“殊途同归”。恰如上文已分析到的元宇宙所塑造的新型模态逻辑能够营造近乎真实的治理场景,模拟“共同在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实体政府+开放平台+虚拟办公”的管理通道,构建“全真在场”以及“深度交互”的政务模式,实现公众对政务环境深度介入并高度敏感,继而构建全景敞视场景将治理需求的模糊性与复杂性转为一种“可读性”,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感知联动。

最后,元宇宙营造“超真实”的治理场景能够模拟并预先形成基于舆情、数据及智能分析

的政府决策系统。以“化万物可感知”的技术潜力,通过“规划”被治理者的活动空间,实现治理者的随时观察与参与。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具有能动性的治理者便能够在情境模拟高度逼真的三维空间中积极寻找关联机制予以提前化解。而例如邻里关系、社区规则、社区组织、情感积累、信任互惠等治理资源都能够实时地映射至元宇宙模拟的治理场景中,依托强大的算力精准测算政策实施概率以及成效。最终,以真实的信息传输和有效的利益表达将有互补需求的双方形成最大可能的联结,促使治理需求从“模糊”走向“清晰”,以“利益共同体”为基,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奠定基础。

(2)从“表象互动”到“共在自治”: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组织优化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嵌入治理的发展,可能导致“被动监管俘获”与政府权力滥用。自实施“互联网+”战略以来,地方政府与互联网企业之间就权力形成了一种“让渡”的默契。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借助数字技术“违规操作”侵犯公民权益。数字技术治理以形式上的多元开放隐匿且加剧了政府数字治理的“单向度管控”,尤其是在基层实践中衍生出大量“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过度主义、官僚主义”,逐渐演化成为“数字利维坦”^[25]。从整体效果上看,我国的数字治理实践更多的是单向赋能政府,国家依靠信息技术实现对民众“全景敞视”的权力监控,而公民却无法通过数字民主来制衡国家的监控体系^[26]。正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政务新媒体等的建设,虽然格外注重对公众参与的宣传,但总体上公众对社会治理的决策影响较小,在本质上并没有实现对数字政府的组织优化,而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公众在信息公开中获取情绪抚慰的“表象互动”。借助元宇宙技术所塑造的新型数字情境治理,或许能够以拓展的时空重构具有高流动性的社会交往关系,促进政府数字治理的组织优化。

其一,实现“政府-社会”的共同在场。开创政府数字治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要求有效补缀“政府-社会”的共同在场模式,实现二者的“同框出镜”,同时满足“国家-社会”宏大关系

架构背后隐喻的个体需求和义务。诚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全面释放了社会动员与聚合的巨大潜力,但却始终没有实现政府与社会双向塑造的有效联结与及时反馈。加之在时空“转换”和信息“裂变”的双重作用下,公众对公共事件的认知无法实现真正地“还原”,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感时常杂糅着刻板认知、不信任等消极情绪而导致舆论对立。因此,实时性一直被认为是此前互联网没有真正解决“在场”的关键问题。而元宇宙在“情境还原”的基础上,支持并确保所有治理行为、反馈以及交互都发生在实时共享且具有时空连续性的虚拟环境之中,有效保障了具体治理情境中“政府-社会”的共同在场。

其二,促进正式制度系统对公众参与行为的有效吸纳。传统政府决策系统的开放大多通过在权力结构中设置稳定的职权身份或者通过在政策场域中设置灵活多样的民主化途径吸纳利益相关者或者专家意见,多为政府单方面提供途径,反馈形式和影响都极为有限。而借助元宇宙技术,首先,政府能够以直接的语音、云视频会议代替现有的文字发布与沟通,公众也可在虚拟空间中直接触发相关议题,主动发起、召开线上会议等。其次,政府或相关机构创建的元宇宙平台,能够以虚拟现实建模与情景模拟的方式向公众展现更多元、真实且可操作的信息。在元宇宙介入的政府治理场景中,突破了传统政府治理的空间想象,政府不仅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还需要不断发展包括政策制定、发展规划、知识传授、成长辅导,甚至情感陪伴的角色和能力。最后,元宇宙内的用户能够通过影像、角色、行为等一系列符号建构“共同仪式”,以线上游戏的形式影响又并非局限于游戏情境内的“使用与满足”,而是以生理层面的“共通感”拓展治理情境的边界,以此建构“共在自治”情境。

(3)从“各自为政”到“协同共创”:元宇宙赋能数字平台建设的有机耦合

通常认为,实现技术赋权的途径包括政府开放数据共享和提供交流互动平台^[27]。蒂姆·奥莱利率先于2009年提出“政府即平台”的理念,将政府在本质上视作一种集体行动机

制^[28]。以平台思维为指引,构建整体性、一体化的数字化治理体系,通过技术赋权的方式加强公民的有效参与,与政府共同创造公共价值被视为是现代数字政府的治理理念与价值目标。当前,我国政府数字平台建设已经实现由内部向外部拓展,数据由静态储存向动态流转,组织边界可渗透性日益增强的整体转型。但按照“内外联动、点面结合、上下协同”的工作思路来看,“各自为政、自成体系、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仍然是当前数字平台建设需要避免的重点问题。但传统互联网技术无法自发促进不同部门、区域和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更加无法解决观念冲突以及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等。而融入元宇宙技术的政府数字治理平台,或许能够为数字平台建设中不同要素之间的有机耦合提供基础设施。

一方面,基于元宇宙技术应用的平台采用开放兼容和敏捷扩展的云端一体化架构,能充分衔接利用现有数字技术在平台建设中的成果,实现全时空、一体化的动态分析和智能仿真决策能力,赋能政府数字治理在“规、建、运、管、服”跨行业多场景应用与业务上的进一步融合协同。尤其是作为元宇宙基础技术的区块链能够支持构建集数字货币系统、智能合约系统以及交易机制于一体的经济系统,在此基础上打造的非同质化通证(non-fungible token, NFT)更能实现唯一的身份认证和确权,继而以全新的社会经济信任系统建立有效的社群观念和互信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治理。

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的政府数字平台,元宇宙内蕴的游戏属性亦有效拓宽了治理创新的实践领域。作为一种自由的活动,游戏有意识脱离平常生活并使之“不严肃”,同时又使游戏人全身心投入、忘乎所以^[29]。而元宇宙游戏世界上演的实际是“共同体的剧本”^[30]。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在数字平台中加入游戏情节的设计,也就意味着公众能够在虚拟世界形成社区集体行动,以“无限游戏”的理念促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虚拟时空中呈现出想象力边界的无限拓展可能。而新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则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的深刻革命,在虚拟治理空间中以多元化的线上游戏链接政府与社会,并不断

强化社会的韧性维度,以此培育公众的创新意识以及激发创新动力。

2. 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行动策略

从近30年政府数字化转型历程来看,数字技术与政府职能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近几年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日益为政府数字治理的精进与高效进行“背书”,并促进政府形成融实体(政府/社会/经济)与虚体(网络/平台/应用)于一体的系统治理^[31]。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顶层布局与地方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始终贯穿其中,作为技术赋能的方法论与动力源。元宇宙作为一种融合多种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媒介,如何将包含技术方法、程序应用以及用户交互在内的技术生态圈全方位地嵌入现有政府数字治理架构,并作为持续的“赋能者”,不仅需要锚定治理需求以及精准把握技术的嵌入维度,更要构建有意义的行动策略充实技术赋能的方法论与动力源。

(1) 重点项目牵引的行动模式

在国家层面,自“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政府就不断提出要加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5G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为迎接元宇宙的到来提前做好了准备。而在地方层面,元宇宙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重点推进工作任务。自2022年以来,多个城市在元宇宙布局上“摩拳擦掌”,开始在政务、文旅、党建、农业等公共领域推出各项支持元宇宙发展的公共政策。例如,广州南沙区上线了全国首个元宇宙政务服务大厅,推出在3D空间进行数字化政务办理业务;北京、深圳、四川、山东等地则纷纷加速进入城市虚拟代言人的新赛道。但技术的不确定性加之政策的宏观性,如何实现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仍是一项极具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自我国“互联网+”战略启动至今,其实践路线大多体现为以重点项目为牵引的建设模式,在重点项目的选择和行动路线设计上,则需要遵照一般技术应用的可行性、成本效益等原则,尤为关键的是,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当前的根本任务规划元宇宙的发展。显然,以元宇宙赋能经济复苏、产业升级以及促进就业、民生福祉等

是当下重要的战略目标,而城市的科学运行和发展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尤其是当前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栖居地”,而智慧城市更是作为各项智能项目和技术战略落地的主要载体。事实上,自2021年开启“元宇宙元年”以来,国内外各大城市都力图将元宇宙的数字空间开拓与智慧城市的转型升级进行整合嵌构,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元宇宙发展的政策措施,以主导未来城市发展新赛道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并最大限度地创造元宇宙时代的数字经济价值。

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强调通过数字孪生赋能城市治理、提升公共服务。事实上,《规划》中提到的数字孪生技术,不仅是作为一种与元宇宙相似的技术形态,更为元宇宙的嵌入铺设了技术基础。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报告《超级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领新风向》指出,中国自2016年将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确认为国家工程之后,其智慧城市市场规模每年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全国有89%的地级以上城市建设了多达500个新型智慧城市项目,占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总量的近二分之一^[32]。在这个意义上,在总体技术集合的战略指导下,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行动模式可以配合智慧城市项目在城市综合管理、交通物流、贸易、能源环境安全、医疗文化教育等5个主要领域,从不同方面、不同环节选定元宇宙的嵌入点以及智慧化升级的作用点,由点及面整体推进,为元宇宙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治理提供方向性指引。

(2) 多元主体联动的行动机制

元宇宙场景的铺设和技术应用本身极具专业性,涉及管理、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创意构建与系统的实践方案设计,其中必然涉及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基于高度复杂智能社会技术系统所进行的协作联动。当前,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仍然是立足于复杂的行政生态,而条块分割的压力型行政体制则容易导致“数据孤岛”“知识遮蔽”以及“权力失衡”等问题的出现,进而阻碍数字政府“整体智治”与“协同共治”的推进。保障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有效性和整体性,不仅需要实现数智技术之间的联结及

功能整合,还需要构建起多元主体联动的行动机制以破除条块分割的困局。

诚然,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的权威、资源、利益与限制,其中,科技本身就是重要的政策博弈主体,正如摩尔定律具有显而易见的强制性,能够强制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源的持续投入。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公司连同其他研究机构的联合协作是更为有效的行动策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中国,能理解和跟上元宇宙步伐的还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就是典型的代表^[33]。而在科技企业主导搭建的技术专业框架下,能够有效助推不同治理主体迅速进入联动创新的全流程协同发展。以浙江为例,在2022年12月发布的《浙江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提出要加快“元平台”布局建设,推进培育元宇宙领域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打造“研究开发-中试验证-场景应用”全链条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全链条技术应用研究中心的打造有助于不同主体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进行广泛互动,形成治理机制复合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联结机制:其一,促使多元治理主体在职能与功能上进行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减少元宇宙技术在嵌入治理过程中与科层组织之间的摩擦,避免在解决旧技术治理遗留的问题时衍生出新的问题;其二,旨在构建主体间能力的适配机制,进行开发适格、验证适格和应用适格的主体选择以及能力匹配。与其他技术集成体不同的是,在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和铺设中,个体亦是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参与行动机制的构建与形塑。元宇宙实现了个体的“虚拟分身”,构建适配个体的媒介链接,通过与个体行为相匹配的元宇宙政务服务语境为用户展示相关信息,如结合用户的查询操作进行智慧推荐,结合用户需求和行为习惯适配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形式等等。简而言之,推进元宇宙在数字政府治理中的应用应更倾向于构建集公共娱乐社交于一体的理想数字社会,其中不仅需要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依托以及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更要允许公众对政府数字治理的进程进行编辑创造。在这个基础

上,多元治理主体间形成共建共融的联动机制,真正达到互补共强。

(3) 多样智能治理连接的行动对象

随着智能革命的兴起,智能技术在治理领域广泛运用,涵盖了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类物质系统。与此同时,在特殊情况下,人群流动及国家-社会之间的高速互动更是被悉数纳入智能治理的清晰视野。而在以科层组织为载体的公共权力资源的衰微和技术治理强制性阐释泛滥的契机之下^[34],智能治理的范围被无限扩大,并不区分人与非人、主体与客体、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在此背景下,就需要实现多样化智能的迭代与交融。曾有学者基于对智慧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提出智慧城市将表现出由“生理智能”“社会智能”和广义“人工智能”等三种智能形式综合形成的“整体谐生智能”^[35]。尽管目前的政府数字治理尚未发展出所谓的“整体谐生智能”,但从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中已经看到了多样智能治理活动联结产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当元宇宙率先应用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时,亦需在元宇宙嵌入城市物理系统和社会系统时协同发展3种智能形态,并逐步联合其他智能技术在整体层面生成“融合”式智能,例如“元城市”的打造。与数字孪生城市不同的是,“元城市”不仅实时全周期映射物理空间内的动态数据,而且能够将城市中所有的人、组织、发生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关系映射至元宇宙的虚拟场景,形成虚实互动与相互赋能。例如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上,“元城市”的虚拟计算治理系统能够将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感知技术、精准的数据分析管理系统以及新颖的可视化方法相融合,在微观能源消耗问题、中观交通拥堵问题以及宏观改善城市环境问题3个层面上创造三赢的解决方案;再如在城市舆情治理中,在“元城市”中建立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的多元治理模型,通过元宇宙的“具身化”技术,实现意识的数据化并从中解析、重构出“虚拟分身”以及“数字化身”,将物理实体空间中的政治意志、文化惯习以及意识形态等同步映射至虚拟空间,最终产生对不良舆情的态势预判、模拟演习、决策优化等功能,生成“现

实问题-符号诠释-科学厘析-智慧纾解”的正态循环治理格局。

简言之,在多样智能治理的行动框架之中,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通过从数据、信息、知识再到智慧的演化,实现虚拟场景中的社会化建构,并最终与真实社会深度融合。而多样智能治理产生的多元、异质、复杂的数据源,可孵化出具有多重可能性与潜能的数字治理活动,在充分考虑建设基础、使用需求、经济情况、市场化水平、回报机制、风险管理等多个维度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治理向智慧治理的整体跃升。

(4)复杂智慧体系融入的行动保障

元宇宙并不是某一项或某几项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结合了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网络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等一系列“连点成线”的技术创新的集成^[36]。根据不同数据来源的特点、应用任务与场景,元宇宙能够有效型构并支撑多种技术组合而成的不同领域的技术集成体。在这个技术架构上,原本孤立的技术体之间紧密互联,一系列具有智能性的技术系统动态组合构成了复杂智慧体系,其表现为在技术治理逻辑下,依托不同新兴技术之间的交互、互补以及增强效应,结合“多源异构大数据+人工智能新算法+领域专家智慧”^[37]的治理决策模式,发展并实践一套多元协同、彼此规约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共同治理模式虽然内生于虚拟场景之中,但却更类似于哈贝马斯口中的社会“综合体”,以相互理解的情境,以及由沟通所形塑出来的生活世界为基础^[38]。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智慧体系的融入模式为不同主体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提供、共同评估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为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行动方案提供了有效保障。

一方面,复杂智慧体系的融入保障了技术进程与治理规律的协调共进。元宇宙联通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需要构建一个连接现实与虚拟的出入口,这个出入接口需要庞大的硬件技术作为支撑。从当前政府的技术资源和发展战略来看,应当进一步优化政府科技资源的配置,加快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数字治理实践,保持对元宇宙技术链中的XR、

MR、云计算等新技术创新应用场景的实时跟进;一是为元宇宙“触地”提供了工具层面的保障;二是辅助了人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各类治理创意实践的设计与实施。

另一方面,复杂智慧体系的融入拓展了政府数字治理的价值边界以及治理场域的重塑。复杂智慧体系不仅体现在多技术之间的交融,亦针对由多元主体在虚拟空间中生产或传播的意识形态以及行为模式进行融合与优化,增强不同治理资源的互补效能,拓展数字治理的价值边界。治理者与公众亦可借助搭载元宇宙政务应用的移动设备,以可视化的仿真表达形式,实现公共服务需求端与供给端更为精准与合理的匹配,突破了层级化所带来的“距离悖论”。

四、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关键问题

1.“脱域”视界下政府数字治理制度的逻辑转换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脱域”的概念,“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9]。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地域的剥离和跃迁,更是个体身份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在吉登斯眼里,“脱域”是现代性产生的重要动力机制,也是现代性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与世界范围内的“脱域”现象相一致,元宇宙的发展进程也是一场人及其关系与资源的“脱域”过程。审视元宇宙带来的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其相伴随的治理关系与治理资源的“脱域”,以及不断穿越于两个时空所导致的某些制度性不匹配因素,思考其中制度演化的转换逻辑,是将元宇宙思想及制度设计引入公共领域的前提。

作为相对独立的虚拟社会系统,元宇宙潜隐的制度性诉求是“自治”,即按自身逻辑运作与存续。而虚拟空间的自治模式与现实的行政区划体制一旦逻辑交织,将急剧改变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秩序,转变制度理性。在此基础上,须提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兼具促进与控制技术发展的政府数字治理制度逻辑转

换问题,需要特别强化在市场规制、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规则设计与边界设定^[40],避免“脱域”的政府数字治理处于“失灵”或者“失控”的状态。

2. “游戏”情境下政务平台公共性的保障

诚如麦克卢汉所言,“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41],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的游戏属性,具有强大的权力规训和形塑认同的作用。虽然,玩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与游戏,甚至可以创建游戏场景,但游戏的内在逻辑与目标意图却是由游戏的设计者所操控的。长期以来,玩家通过协商行为创造属于群体内部的编码,生产新的话语方式用以规避内容审查^[42],这在线上游戏社区已经形成司空见惯的默契。例如“伪造”新的身份认证,登录境外服务器设置搭建非法虚拟专用网络等。尽管这些玩家并非有意对抗国家政策,但却彰显了玩家为了克服游戏限制所可能达成的集体意向以及行动,而这种行动的背后正是基于线上游戏社区中玩家对正义达成的某种共识。在康德看来,公共性总是与正义相关联。而基于元宇宙游戏模式的自助式平台治理,极有可能导致公共性与正义相抵牾^[43],玩家通过实践另类正义侵蚀政务平台的公共性,更可能以游戏特有的重启性削弱公共事务的严肃性。

简言之,深度思考元宇宙游戏情境下政务平台的运作逻辑,有助于清晰地呈现进入元宇宙世代之后政府数字治理的实践表征及其杂糅于游戏中多股经济力量与诸种权力博弈之间的动态关系。

3. “超真实”符号世界的内生风险

元宇宙借助计算机、全息成像、VR 实时渲染等虚拟现实技术构成的拟真世界,赋予政府数字治理场景“真实的虚拟”与“虚拟的真实”并存,实现对真实世界极度地“仿真”,并以“仿真”的逻辑生产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符号系统和象征意义,以此维系和发展各种社会关系,继而进入鲍德里亚所谓“超真实”的状态。这种“超真实”进一步使符号系统与现实制度发生断裂,符号进入到无限复制与高速流动的状态之中,并把社会推向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44]。这也意味着,所有治理问题与

治理过程被强制全量映射纳入既定的符号系统,并把现实中无法被抽象与数字化的问题排斥在治理系统之外而依然享有正当性。从宏观角度来看,决策者的认知影响符号系统的完备程度,这种人为设计的符号系统,经常会忽略社会的真实性和秩序的复杂性。毕竟,任何生产活动都依赖于非正式的随机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设计在正式的规划^[45]。从中观角度来说,元宇宙使得没有本源的超真实变成了存在^[46],一旦各级政府认可了这种超真实的符号系统,并依赖其进行治理与决策,必然会阻碍对现实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导致公共政策的异化。从微观来看,政府是符号系统的主要构造者,其构造内容与关注重点决定了社会现实多大程度被描绘、又描绘成何样,因此,必须警惕“洞穴之喻”陷阱下治理者出现的“表演”冲动。

五、结 语

目前有关元宇宙理论以及实践的动态发展,其意义和价值都取决于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嵌合的紧密程度——嵌合的程度越强,其价值越高^[47]。尽管当前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广受青睐,但新技术的涌现效应则以市场优势为导向,而置换到公共领域,政府治理并不是仅由市场导向下的效率所决定的实践场域,更需要公平、民主、正义等价值准则的嵌入。因此,技术赋能的成效评价不应局限于技术的先进性、系统的完备性等层面,更须考察是否促进了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化的交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等公共面向。而元宇宙对公共领域的重塑,在本质上更好地揭示了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所产生的多维意义和价值。基于哈贝马斯“世界公共领域”^[48]的视角,不仅在普适性层面实现对个体多样性的尊重,更能够以命运共同体为理论先导,架构更适宜中国国情的数字治理生态。

在追问元宇宙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和复兴技术治理的辉煌时,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的“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行动”^[49]或许能为我们从总体上认识包括元宇宙在内的数字技术如何发展提供了线索。结合技术治理在中国

场景下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探讨一种新技术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需要在学术想象力方面进行修炼。想象不仅是“利用信息,发展理性”的“心智的品质”^[50],更是在带有价值倾向的判断中,从对客观知识的“筛选”完成对主观能动性的“构建”。正如当前有关元宇宙的讨论中,“场景为王”的观点自然能够印证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自由增进论,但事实上,对这一主张的证明方式却极有可能限缩了元宇宙超越一般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数字治理方案的可能性。当然,与各学科、各行业领域对元宇宙趋之若鹜相伴的是批判与质疑之声亦不绝于耳,而想象的基本任务就是认识和解释它们。与此同时,更要警惕“缸中之脑”的陷阱,对侵入人体的技术进行道德维度的批判与立法管理,以及严格谨慎的衡量监管是极为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尼尔·斯蒂芬森.雪崩[M].郭泽,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29.

[2] 于京东.元宇宙——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重构与挑战[J].探索与争鸣,2021(12):42-53.

[3] 喻国明,耿晓梦.元宇宙: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3):110-118.

[4] 徐晓林,李卫东.电子政务成熟度评价的四个基本维度[J].电子政务,2007(8):39-44.

[5] 简·E·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M].邵国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

[6] 蓝志勇.全景式综合理性与公共政策制定[J].中国行政管理,2017(2):17-21.

[7] 朱嘉明.元宇宙·制度设计·公共选择——如何解读元宇宙和 all in[J].经济导刊,2022(2):58-65.

[8] 央广网.游戏产业“再认知”:助力文化软实力塑造,科技属性带来共振效应[EB/OL]. [2023-02-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898135300052955&wfr=spider&for=pc>.

[9] 刘擎.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西方:2003—2019[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194.

[10]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M].袁俊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18.

[11] 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8.

[12] 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M].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3] 阳军,樊鹏.新技术革命的风险、挑战与国家治理体系适应性变革[J].国外社会科学,2020(5):125-131.

[14] 梁宇.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J].哲学研究,2015(5):31-35.

[15] 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M].张行舟,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270.

[16]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8.

[17] 李洪雷.论互联网的规制体制——在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之间[J].环球法律评论,2014,36(1):118-133.

[18] 邓建鹏.元宇宙经济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J].电子政务,2023(1):91-99.

[19] 杨禧羨,喻国明.数字化“天下”版图:元宇宙视阈下的国际传播新范式[J].对外传播,2022(4):8-11.

[20] 吕鹏.“元宇宙”技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J].产业经济评论,2022(1):20-27.

[21] 焦艳鹏.元宇宙生活场景中的利益识别与法律发展[J].东方法学,2022(5):30-44.

[22] 王寅.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数字政治——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共产主义发展视阈[J].贵州社会科学,2021(7):31-42.

[23] 胡泳,刘纯懿.元宇宙转向:重思数字时代平台的价值、危机与未来[J].新闻与写作,2022(3):45-55.

[24] 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J].社会,2018,38(3):46-78.

[25] 郎彦辉.数字利维坦:信息社会的新型危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19(3):46-51.

[26] 肖滨.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双面性与非均衡性[J].学术研究,2009(11):31-36.

[27] 何圣东,杨大鹏.数字政府建设的内涵及路径——基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分析[J].浙江学刊,2018(5):45-53.

[28] O'Reilly T.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J].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2011, 6(1):13-40.

[29]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

- 究[M]. 傅存良,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4.
- [30] 喻国明,陈雪娇. 元宇宙视域下传播行为的路径模型与拓展机理[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6):135-145.
- [31] 江文路,张小劲. 以数字政府突围科层制政府——比较视野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与演化图景[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6):102-112.
- [32] 丁波涛. 从信息社会到智慧社会:智慧社会内涵的理论解读[J]. 电子政务,2019(7):120-128.
- [33] 朱嘉明. 元宇宙与数字经济[M]. 北京:中译出版社,2022:253.
- [34] 朱婉菁. 算法维度下人工智能嵌入治理的风险研判及政策因应[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22(6):12-22.
- [35] 夏昊翔,王众托. 从系统视角对智慧城市的若干思考[J]. 中国软科学,2017(7):66-80.
- [36] 刘雪莲. 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J]. 世界社会科学,2023(1):63-75.
- [37] 赵星,乔利利,叶鹰. 面向数据智能和知识发现的图书情报学跨界拓展——数据—学术—创造整合论[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6):16-25.
- [38]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71.
- [39]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18.
- [40] 戴元初. 元宇宙:媒介属性、进化路径与治理逻辑[J]. 国家治理,2022(2):21-26.
- [41]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91.
- [42] 王昀. 另类公共领域? ——线上游戏社区之检视[J]. 国际新闻界,2015,37(8):47-66.
- [43] 程金华. 元宇宙治理的法治原则[J]. 东方法学,2022(2):20-30.
- [44] 向玉琼. 把时间和空间带回来:论政策过程中的符号变革[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1):1-8.
- [45] 詹姆斯·C.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王晓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
- [46] 李世雁,张一鸣. “看”的技术在社会建构中的解构[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10):99-106.
- [47] 何哲. 虚拟化与元宇宙:人类文明演化的奇点与治理[J]. 电子政务,2022(1):41-53.
- [48]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82.
- [49] 保罗·利科. 从文本到行动[M]. 夏小燕,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3.
- [50]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

(收稿日期:2023-02-28 编辑:高虹)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taverse Empowering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Logical Reasoning, Overall Strategy, and Key Issues/ZHU Wanjing (Law School,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Metaverse marks the advanced stage of social digital development, which is bound to lead to further creation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governance in technological narratives, as well as the “game” super domain effect based on commercial capital operation in reality, reveal the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s of empowering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Metaverse.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op-level design and low-level follow-up, a logical approach with the clue of “principle-mode-carrier-efficiency” is proposed. Among them, the mixed law system of digital technology-economy supported by the Metaverse provid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s a governance principle, while the new digital situ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developed endows the subject with the “presence” ability through “replacement” and “imitation” logic, and constructs the “free person consortium space” as a carrier to strengthen the subjectivity status of people in digital governance, ultimately achie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centered on order and justic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dilemma of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empowering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Metaverse is

constructed, which includes anchoring real governance needs, optimizing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upling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with three empowering paths, as well as forming an action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key projects traction, multi agent linkage, diverse intelligent governance connec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mplex intelligent systems. In the future, the key to empowering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Metaverse lies i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tachment”,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government platform publicity in the context of “gaming”, and guarding against the endogeneity risks of the “hyper real” symbolic worl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reflects and questions how the Metaverse can continue and revitalize the brilliance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 words: Metaverse; digital governance; empowerment; delocal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江苏省流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在河海大学举行

9 月 28 日,江苏省流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在河海大学举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孙轶、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纪委书记唐晓虎、河海大学党委书记唐洪武等领导以及水利部、省外事办公室、河海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同志出席了本次活动。唐洪武在致辞中表示,河海大学因水而生、缘水而为、顺水而长。作为中国水利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学校在流域文化传播上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厚积淀。20 世纪 90 年代,学校建设了新闻与传播学学科,在水环境、水科技、水文化传播和水利舆情监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和创新性突破,为流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丰富了载体和力量。此次江苏省流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学校把握发展机遇,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校着眼水安全、水文化战略全局,统筹流域研究力量,丰富流域治理与文化研究,讲好流域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贡献河海力量的创新举措。

孙轶为中心授牌,孙轶和唐洪武为中心顾问颁发了聘书。江苏省流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将建设成为立足江苏、面向世界的河域流流域文化传播的共同平台,为水文化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治水故事书写好大文章。

来自河海大学官网